

1

見證者說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浙江紹興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命名者。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唯一的印刷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民國年間，擔任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之職。1949年赴台灣，先後出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中國國民黨史會主任委員、中國筆會會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五四運動的精神

原載《每週評論》第23號，1919年5月26日。

什麼叫做「五四運動」呢？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壓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大家不可忘了！列隊示威在外國是常有的事，何以我們要把他看的大驚小怪呢？

不知這次運動裏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從前我們中國的學生，口裏法螺破天，筆下天花亂墜，到了實行的時候，一個個縮頭縮腦。比起俄國朝鮮的學生來，真是慚愧死人哩！惟有這次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傷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傷而憤死的也有，因賣國賊未盡除而急瘋的也有。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元素。

第二，這次運動是社會裁制的精神，當這個亂昏昏的中國，法律既無效力，政治又復黑暗，一班賣國賊，宅門口站滿了衛兵，出來坐着飛也似的汽車，車旁邊也站着衛兵。市民見了敢怒不敢言，反覺他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他們也未始不微微笑道：「誰敢動我？」那知道一被手底無情的學生，把那在逃的嚇得如喪家之犬，被捉的打得發昏之十一章。他們那時候才知道社會裁制的利（厲）害！這次學生雖然沒有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打死，但是把他們在社會上偶像打破了！以後的社會裁制，更要多哩！我敢正式告我國民道：在這無法律政治可言的時候，要想中國有轉機，非實行社會裁制不可！

第三，這次運動是民族自決的精神。無論什麼民族，都是不能壓制的，可憐我們中國人，外受強國的壓制，已經奄奄無生氣了。當這解放時代不能自決，還待何時？難道中國人連朝鮮、印度人都不及嗎？這次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表示，是中國民族對於自決的第一聲。不求政府直接懲辦賣國賊，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這次運動是二重保險的民族自決運動。

總觀以上的理由，我也不用多說了。只是高呼道：

學生犧牲的精神萬歲！

社會裁制的精神萬歲！

民族自決的精神萬歲！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今安慶）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五四運動的思想指導者，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創始人，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1916年改名《新青年》。同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選為中央局書記。1929年11月被開除黨籍。1932年10月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後囚禁於南京。1937年8月出獄。1942年5月逝世。

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

原載《時事新報》，1920年4月22日。

如若有人問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大概的答詞必然是愛國救國。我以為五四運動的發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國政府的兩種壓迫而成的，自然不能說不是愛國運動。但是我們的愛國運動，遠史不必說，即以近代而論，前清末年，也曾發生過愛國運動，而且上海有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校。十年前就有標榜愛國主義的運動。何以社會上對於五四運動無論是讚美、反對或不滿足，都有一種新的和前者愛國運動不同的感想呢？他們所以感想不同的緣故，是五四運動的精神，確比前此愛國運動有不同的地方。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精神。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於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因為法律是強權的護符，特殊勢力是民權的仇敵，代議員是欺騙者，決不能代表公眾的意見。清末革命的時候，人人都以為從此安寧了，不料袁世凱秉政結果，反而不好。袁世凱死的時候，人人又以為從此可以安寧了，不料現

在的段祺瑞、徐世昌執政，國事更加不好。這個時候，中國人因為對於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斃的現象。自從德國大敗、俄國革命以後，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變。於是，中國人也受了兩個教訓：一是無論南北，凡軍閥都不應當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動的希望。五四運動遂應運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學生，所以對於五四運動有新的和前次愛國運動不同的感想，就是因為學生運動是直接行動，不是依賴特殊勢力和代議員的卑劣運動呵！中國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犧牲，得很大的效果。這病不改，中國永遠沒有希望。社會上對於五四運動，與以前的愛國運動的感想不同，也是因為有無犧牲的精神的緣故。然而我以為五四運動的結果，還不甚好。為什麼呢？因為犧牲大而得結果小，才是好現象。此時學生犧牲的精神，若不如去年，而希望效果，卻還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現象了。以上這兩種精神，就是五四運動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諸君努力發揮這兩種精神，不但特殊勢力和代議員不是好東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賴。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賴，就是學界的分子好朋友，都不可依賴。最後只有自己可靠，只好依賴自己！

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

原載《政論》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

有人以為「五四」運動時代已經過去了，時代已經走到前面，人們的思想如果還停留在「五四」運動時代，那就未免太落後了。

這種意見是正確的嗎？要研究「五四」運動時代已否過去，必須要明白「五四」運動時代是什麼一個時代，並且必須具體的指出「五四」運動時代要求的是什麼，現在是否還有這些要求，如此則「五四」運動所代表的時代性，和這一時代現在是否已經過去，便不致閉眼胡說的了。

「五四」運動時代所要求的是：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及賣國賊；

反對舊禮教的束縛，提倡思想解放、婦女解放，以掃蕩封建的殘餘；

提倡科學，破除迷信，建設工業；

反對古典文，提倡語體文，以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權，反對官僚政治。

這些要求現在已經過去了，或完全過去了嗎？「五四」運動時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卅運動，而北伐戰爭，而抗日戰爭，是整個的民主革命運動時代之各個事變。在各個事變中，雖有參加社會勢力廣度之不同，運動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時代性，並沒有根本的差別。所以「五四」運動的缺點，乃參加運動的主力僅僅是些青年的知識分子，而沒有生產大眾，並不能夠說這一運動的時代性已經過去。這一時代性不但現在不會過去，即在近的將來，離開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民族獨立也是民主革命要求之一），不會推動什麼革命，並且連規模較大的運動也不會有。政治經濟之發展，會因革命的動力不同而異其形態；而推動革命的歷史任務，必然是民主民族的要求，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條件所決定的，人們頭腦中的幻想不能夠改變它。

正因為有些人們雖然口中也曾說說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實際上並沒有認真的了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時代性，所以才會有「五四」運動時代已經過去這樣的見解，所以才有拿農村蘇維埃抵制國民會議運動的荒謬政策，所以才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才鬧出「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以及由打倒富農到「請土豪劣紳幫忙」，由蘇維埃政府到國防政府，由普羅文學到國防文學，由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到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大串頭腳顛倒亂雜無章的政策，都由於未能了解並把握這一時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

現在或者已經過去的是這班頭腦昏亂的人們，而不是「五四」運動時代，現在一代的青年，不可再重覆這樣的錯誤了。所以我在大家回憶「五

四」運動的今天，不得不指出「五四」運動之具體要求所代表的時代性，這不僅僅為了說明「五四」運動的意義，重要的還是為了指出青年們參加政治運動的據點，即是：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參加一切民主民族的鬥爭。要堅守住這一據點，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昏亂思想從根剷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16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積極投身於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領導和推動五四運動的發展。1920年初，與陳獨秀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活動，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3月，在北京大學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7年4月在北京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英勇就義。

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

原載《晨報》，1921年5月4日。

五月四日這一天，是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因為在那一天，中國學生界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當做一個紀念日。

我盼望中國學生界，把這種精神光大起來，以人類自由的精神撲滅一切強權，使正義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於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狹小了，把他僅僅看做一個狹義的愛國運動的紀念日。我更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

謹祝中國學生界的進步無量！

在北京學生聯合會紀念五四大會上的演講

原載《晨報》，1923年5月5日。

今天是「五四」紀念日，是學生加入政治運動之紀念日，也是學生整頓政風的紀念日。因為政治不澄清，使我們不能不犧牲求學之精神，而來干涉政治。民國到現在十有餘年，革命事業，還未成功，這些繼續革命事業的人，就是我們。但是我們做這種事業，必須抱定目的和宗旨。以現在學生應該做的事有二種：（一）組織民眾，以為達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對現政局〔府〕立於彈劾的地位。因為我們先〔光〕組織民眾是不行的，他們是可以破壞我們組織民眾的事業。望學生對於以上二事努力去做，則將來自有極大之效果。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成為繼陳獨秀之後，中國共產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1928年5月抵達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兩年。1930年回國，留在上海養病，進行文藝創作和翻譯，與魯迅、茅盾來往結下深厚友誼，領導左翼運動。1934年奉命離開上海，到達江西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等職。紅軍決定長征後，被留在江西，突圍不成被捕。1935年6月18日就義。

五四紀念與民族革命運動

原載《嚮導》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五月四日這一天，當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紀念日，這是大家都承認的。社會上對於五四有兩種認識：或認他只是一個學生運動的紀念，或認他是中國新文化運動，所謂「思想革命」的高潮時期。誠然不錯，民國七八年來的思想革命運動，經過五四運動之後，得到一時期的充分發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以及「戀愛自由」、「勞工神聖」的口號，都是五四之後才普遍於社會（尤其是學生群眾之中）的。然而單認五四只是學生愛國運動及思想革命的紀念，未免減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義。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裏的革命潮流，因袁世凱的反動而低落下去。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幾乎一般社會都認革命是作亂，民黨是亂黨，這個時期的現象：第一、民黨中的右派，宋教仁、黃興等在二次革命前力主妥協緩進，使袁世凱得以借帝國主義之幫助鞏固反動勢力，在二次革命後，居然有許多民黨投降軍閥，受其收買；第二、這些右派於宋案發生